

# 维吾尔语中的若干汉源词考释\*

吾尔开西·阿布力孜

[提要] 本文对维吾尔语若干词汇成分的词源进行考释,主要包括与汉语关系密切的 bi: “刀具”、čükä/čökä/čoka/čöki “筷子”、jimbil “蒸篦子”、čöčürä “馄饨”和 \*düm “炖”等。经考释,认为 bi:<“匕”、čükä/čökä/čoka/čöki<“筴”、jimbil<“甑算儿”、čöčürä<“煮角儿”、\*düm<“炖”为汉源词,而 čükä/čökä/čoka/čöki “筷子”为维吾尔语的汉语底层词。

[关键词] 维吾尔语 汉语 汉源词 借词 语言底层

## 一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可考据的历史文献显示,维吾尔语与汉语从古至今一直处于密切的接触之中。从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献到回鹘文献,近代维吾尔文献到现代维吾尔语,从日常生活用语到文化词汇,维吾尔语都有汉源词的痕迹。这些汉源词对追溯维吾尔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交融等具有重要启示。词源学研究在文化史、民族交往史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维吾尔语历史语言学研究也应包括词源研究,以便探讨维吾尔语与其他语言的接触与影响。本文考证维吾尔语若干词汇的词源。

## 二 若干词汇的词源考释

据我们研究,维吾尔语有若干词源自汉语。

### (一) bi:

在古代维吾尔文献《弥勒会见记》(耿世民 2008)中,出现了 6 次 bīi bīčǵu 和 2 次 bī bīčǵu。bī bīčǵu 应为 bīi bīčǵu 的误写或误读。耿世民(2008:489、486)将对偶词 bīi bīčǵu 翻译为“刀具”和“刀剑”。bīi bīčǵu 和 qilič “剑,马刀”一起出现时,耿世民(2008:285)将整个短语也译作“刀剑”。回鹘文文献中对偶词现象多见,一般由词性相同、语义相近的两个词合在一起使用(张铁山 2005:169; 木巴来克·司康旦尔 2017)。bīi bīčǵu 中的 bīčǵu “刀具”是由动词 bīč- “切”(现代维吾尔语为 pič- “切”)加构词词缀 -GU 派生的名词,很容易推断其语义为“用来切割的工具”,即“刀具”(Clouston 1972:294; Wilkens 2021:166)。那么与之相配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回鹘文献整理与研究·俄、日藏回鹘文献整理与研究(20 & ZD211)”的阶段性成果。曾在“中国民族研究社团 2020 年联合学术大会”(昆明 2020.10.7-8)上宣读。本文的写作得到艾尔肯·阿热孜、力提甫·托乎提、张铁山、热孜娅·努日诸教授的指导,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谢忱。文中若有疏漏概由笔者负责。

的 *bīr* 也应该是表示刀具的名词, Clauson (1972:291) 也将其语义解释为“刀或刀类物品”, 并将该词转写为 *bi*, 这与耿世民 (2008:486、489) 用两个 *i* 重复表示长音的意见相同。但要注意, 耿世民 (2008:486、489) 将其中的元音读作后元音 *i*, 而 Clauson (1972:291) 则认为 是前元音 *i*。这里不妨看一下其他学者的转写, Kara & Zieme (1976:69)、Câferoğlu (1993:27)、Kaya (1994:260)、Shōgaito (庄垣内正弘) (2003:353) 转写为后元音 *bī*; Rachmati (1932:428) 转写为 *bi*; Wilkens (2021:166) 则认为 *bī* 是过时的、错误的读音, 应转写为 *bi*。但以上学者均没有标示长元音。另外, 关于古代维吾尔语 *bīčaq* “刀”的词源问题, Clauson (1972:293-294) 等学者认为“*bīčaq* ‘刀’由动词 *bīč-* ‘切’派生而来”。但 Erdal (1991:47) 考证出“*bīčaq* ‘刀’由 *bī* ‘刀具’而来”。《突厥语大词典》(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1(1):404) 和《福乐智慧》(优素福·哈斯·哈吉甫 1984:202) 中, *bīčaq* “刀”还有 *pičäk* “刀”和 *bičäk* “刀”的变体。因此, *bī* 确实有读作前元音 *bi* 的情况。为了统一表述, 本文记作 *bi*。

Clauson (1972:291) 认为, *bi*: 可能来自于汉语的“劈”。汉语中古音“劈”为滂锡开四入, 普击切(郭锡良 1986:87-88)<sup>①</sup>, 《康熙字典》(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2007:72) 引“《唐韵》普击切”, 高本汉 (2021) 没有构拟该字的中古音, Pulleyblank (1991:236) 构拟其晚期中古汉语形式为 \**phjiajk*。根据庄垣内正弘 (1987:23-24、89) 的汉语—古代维吾尔语对音拟测“劈”进入古代维吾尔语中的语音, 则滂母对应古代维吾尔语 *b*, 锡开四对应 *ik*。张铁山 (2005:119-136) 也曾探讨过汉语—古代维吾尔语的对音, 朱国祥 (2013)、张铁山、朱国祥 (2014) 的结论与张铁山 (2005:119-136) 基本一致。据此, 滂母对应 *p/f* (张铁山 2005:126), 锡韵对应 *ik* (张铁山 2005:133)。罗常培 (2012:40、85、113、162-163) 将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滂母构拟为 \**p'*, 锡开四构拟为 \**ig*; 还将五代敦煌方音中滂母构拟为 \**p'*, 锡韵构拟为 \**ig*。高田时雄 (1988:65、181) 则将滂母构拟为 \**p'*, 锡开构拟为 \**iäk*。滂母在宋代西北方音中为 \**p'* (李范文 1994:213), 锡开四为 \**iʔ* (李范文 1994:323)。也就是说, 直至 12 世纪, 锡韵都应带一个辅音韵尾。这证明至晚 11 世纪已借入古代维吾尔语的“劈”应该作 \**bik*、\**pik* 或 \**fik*, 带尾音 *-k*<sup>②</sup>。但 *bi*: 并不以 *-k* 收尾。因此, Clauson (1972:291) 的看法不成立。

笔者认为, *bi*: “刀具”源自汉语“匕”。《诗经》中“匕”字指勺子(高本汉 2021:208), 另指一种取食的器具(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2010:300); 《说文》:“匕, 相與比敘也。从反人。匕, 亦所以用比取饭。一名柶”(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2007:81); 《左传》中指箭头(高本汉 2021:208)。根据《通俗文》的记载“匕首, 剑属。其头类匕, 故曰匕首”(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2007:81), 汉唐时“匕”字就已经演变出“刀”义。后来“匕”作“刀具”义越来越常见, 如《资治通鉴》八十八卷“六修与汉中山王曜战于汾东, 曜兵败, 坠马, 中匕创”。“匕”字中古音为帮脂开三上, 卑(卑)履反(郭锡良 1986:85)<sup>③</sup>, 高本汉 (2021:208) 构拟为 *pji*。可见, “匕”可与 *bi*: “刀具”勘同。罗常培 (2012:40、66、113、143) 认为, 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帮母为 \**p*, 脂开三为 \**i*; 五代敦煌方音帮母为 \**p*, 脂开为 \**i*。高田时雄 (1988:52、126-127)

<sup>①</sup> 《广韵声系》(沈兼士 1985) 无“劈”字。

<sup>②</sup> 关于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成书年代, 国外有 9-10 世纪说 (Le Coq)、9 世纪说 (Gabain)、最晚 9 世纪说 (Pritsak)、9 或 10 世纪说 (Zieme)、最晚 10 世纪说 (Ş. Tekin)、9 世纪中叶说 (Laut) 以及最晚 9 世纪后期说 (Ağca), 请参见 Ağca (2006)。国内有 11 世纪说 (冯家昇 1962)、8-9 世纪说 (耿世民 1986) 和 9-10 世纪说 (耿世民 2008)。尽管有所分歧, 但学界已认定《弥勒会见记》不晚于 11 世纪。

<sup>③</sup> 沈兼士 (1985:466) 旁注为非舌开四, 本文从郭锡良 (1986:85)。

认为 9、10 世纪河西方音中帮母为 \*p, 脂开为 \*iəi。李范文 (1994:210-212、293) 认为 12 世纪西北方音中帮母为 \*p, 脂开三为 \*i。庄垣内正弘 (1987:23-24、72) 认为帮母对回鹘语 b, 脂开三对回鹘语 i/ī。张铁山 (2005:126、128) 指出, 帮母对回鹘语 b/f/v/w, 脂韵对回鹘语 i/ī。综上, 从语义和音韵方面可以确认 bi: “刀具”的词源是“匕”而非“劈”。

Clauson (1972:291) 还认为 bi: “刀具”可能是动词 bi:lä- “磨(刀)”的词根。我们认同这一观点。词缀 -lA 在众多突厥语族语言中都非常能产, Erdal (1991:455) 认为古代维吾尔语中“实际上一个由 -lA 派生的动词可以表示与词根意义有关的任何意义”。该词缀在古今维吾尔语中的功能一致, 力提甫·托乎提 (2012:180) 认为“(-lA 在现代维吾尔语中) 缀加在一部分名词后面, 构成表示该名词所表达的事物或内容成为现实的动词”。[bi:+-lā] 由“使(某物)变成刀具”之义具象化为“磨(刀)”之义。《突厥语大词典》记载了 bi:lä- “磨(刀)”的多种形态, 包括原态 bilädi “磨”及其静词化形式 bilär—bilämäk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1(3):263-264)、使动态 bilätti “使磨”及其静词化形式 bilätür—bilätmāk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1(2):321)。还有例句 ol pičäk bilätti “他让磨刀了, 即他让在磨石上磨刀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1(2):321)、ol pičäk bilädi “他磨刀子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1(3):263-264)、ol tış bilädi “他磨牙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1(3):264)。另外, 在 bi:lä- “磨(刀)”的基础上又派生了 bilägü “磨刀石”(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1(1):472)。该词在现代维吾尔语中语音演变为 bi:läy “磨刀石”, 而 bi:läy “磨刀石”在吐鲁番土语中进一步磨损为 bü:lö “磨刀石”。bi: “刀具”、bi:lä- “磨(刀)”、bi:läy “磨刀石”中的 bi: 及 bü:lö “磨刀石”的第一音节均为长元音。

此外, Clauson (1972:291) 还将 bis “刃”的例子 y[üli]günüñ bisi tä:g “犹如剃刀的刀刃”归入 bi: “刀具”词条中。但是考虑到突厥语族语言的共有动词 bilč-/pİč- “切”以及“动静同根”现象, 辅以突厥语族语言中 s/š 两音的交替现象, bis “刃”应与 bilč-/pİč- “切”同根, 与 bi: “刀具”无关。

## (二) čökä/čökä/čoka/čöki

Clauson (1972:414) 在其词典中认为: “čökä 来自于动词 čök-。遗存在东南突厥语中, čökä ‘天平之杆’; ‘筷子’ (可能是某一汉语短语的变体); 还遗存于西南奥斯曼土耳其语, čökä ‘骆驼的胸’ (骆驼跪地时其胸脯会碰到地上), 如 Uyğ. vın ff. Bud 中出现 qılğuluq čökä yañın ‘应该做的服从’; 《高昌馆杂字》记载, 筋 ‘筷子’ čöki”。Clauson (1972:414) 所讨论的 čökä 可以分成 3 个义项: čökä<sub>A</sub> “天平之杆”、čökä<sub>B</sub> “骆驼的胸脯”、čökä<sub>C</sub>/čöki<sub>C</sub> “筷子”。

Clauson (1972:414) 认为, 3 个义项中的 čökä 均是动词 čök- “沉没; 下跪”的派生词。但实际上, 只有 čökä<sub>B</sub> “骆驼的胸脯”是由 čök- 派生的固有词。《突厥语大词典》记载了 čök-čök “让骆驼卧倒时使用的象声词”(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1(1):353)、čöküt “矮, 矮子”、čöküt kiši “矮个子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1(1):374)、čökütlük “个子的矮挫”(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1(1):530) 等词, 都与动词 čök- “沉没; 下跪”有语义和语音联系。Courtelle (1870:296) 解释近代维吾尔语的 čök- 为“骆驼卧倒”, čäkä 为“骆驼的胸部”。现代维吾尔语中, 骆驼卧倒仍称作 tögä čökti。动词 čök- “骆驼卧倒”与 čökä “骆驼的胸”有明显的语义与形态关系, 但我们尚不清楚该词的构造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至于 čökä<sub>A</sub> 和 čökä<sub>C</sub>/čöki<sub>C</sub>, 联想到天平的秤杆也是一根杆, 与一对细杆组成的筷子形似, 因此, čökä<sub>A</sub> 应是“筷子”义的 čökä<sub>C</sub>/čöki<sub>C</sub> 的引申义(阿布利孜·牙库甫等 1991:689)。Clauson

在撰写该词条时的引证文献是包尔汉(1953:268)的《维汉俄辞典》。此前的文献只有杨涤新(1947:28)《维汉字典》中有 *čükä*, 解释为“支柱, 棍棒”。而该词“支撑某物的细棍”义在现代维吾尔语吐鲁番土语中仍然存在。这从另一方面证明, *čökä<sub>A</sub>* 应该是近期才由 *čökä<sub>C</sub>/čöki<sub>C</sub>* 产生的引申义。

那么 *čökä<sub>C</sub>/čöki<sub>C</sub>* 的词源呢? 与维吾尔语有比较紧密的词汇借贷关系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并没有能与 *čökä<sub>C</sub>/čöki<sub>C</sub>* 对应的词汇, 而“筷子”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器具。据此, 我们假设 *čökä<sub>C</sub>/čöki<sub>C</sub>* 来自汉语。汉语史上, “筷子”曾有“箸/筯/筴/桠/快/筷”等多种名称。其中“箸/筯/筴/桠”在《礼记》中就已经有记载。冯·加班(1989:66)指出高昌回鹘时期, 筷子就已经在回鹘社会中逐渐流行起来, 人们使用一双木筷或一双骨筷吃东西。但是《突厥语大词典》中并没有关于筷子的记载。这也印证了冯·加班(1989:66)“筷子是悬挂在高贵人物腰带上的一种装束”的说法, 并没有真正在民间传播开来。可见, 高昌回鹘时期, 回鹘人刚刚接触筷子, 起初作为身份象征, 只有贵族才使用。

上文的 *čökä<sub>C</sub>/čöki<sub>C</sub>*, 在历代维吾尔语文献和现代维吾尔语中存在多种变体, 如《五体清文鉴》中的 *čöki* (塔依尔·阿布都外力等 2016:577)<sup>①</sup>、《汉回合璧》中的 *čökä*, 汉字注音为“求克”(陈宗振 1989), 现代维吾尔语文学语言的 *čoka*、维吾尔语吐鲁番土语的 *čükä* 等<sup>②</sup>。关于其词源, 陈宗振(1982)认为, 维吾尔语词汇 *čoka* 来自“竹筷”, 指出竹字的声母在维吾尔语中变为 *č*, 其韵尾的 *-k* 与筷字的声母 *k-* 连在一起时发生减音现象。一般认为, “箸”称为“快”见于明代, 后由吴语传入官话。原先学界认为“箸”称为“快”是源自吴中船家避讳之言。后有杨琳(2017)指出, 北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后集》中已经出现了“快筯旧尝便蛮耳”, 但这是孤例, 因此, 退而求其次, 基于元末明初的相关文献得出结论, “箸”称为“快”源自“箴竹”, 因字形复杂, 以“快”代替, 而且元代某些方言中“快子”已经流行。至清代, 学者们才造出“筷”字(殷晓杰、陈春雪、陈佳 2017)。甚至, 《康熙字典》也未收“筷”字。总之, “箸”称为“快”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元末明初, 这比回鹘文献中“筷子”的记载时代至少晚一百年。“筷”字被社会普遍接受更是清嘉庆之后的事情(杨琳 2017)。可见陈宗振(1982)所指出的 *čoka/čükä* 的汉语本字有待进一步研究。

历代维吾尔语文献中, 最早记载“筷子”的是现存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的一份回鹘文遗嘱, 收藏编号 Ot. Ry.1414b。山田信夫(1993:137)整理回鹘文契约文献时编号为 WP03, 其第十行和第十一行出现了 2 次 *čöki* 表示“筷子”:

*bir ča-čan, iki sİR qašuq, altİ kišlik sİR čöki, säkiz on kišlik qİzil čöki*  
 一 茶盞 二 漆 勺 六 人份 漆 筷 八 十 人份 红 筷  
 “一个茶盞、两个漆勺、六人份漆筷、八十人份红(木)筷”

森安孝夫(1994)根据文书的字体为半楷体、区分 *q/ğ* 等特征判断此文书属于 11-12 世纪。此后明代编撰的《高昌馆杂字》记载: *čögi*, 捌几, 筯/箸(胡振华、黄润华 1984:46、82)。《高昌馆杂字》中的维吾尔语词汇是用回鹘文记录的, 而回鹘文中 *k* 与 *g* 用同一个字母表示。因此, 《高昌馆杂字》中也应读作 *čöki*。清朝乾隆年间编撰的《五体清文鉴》中同样记

<sup>①</sup> 近代维吾尔文不区分 *o/u/ö/ü*, 此处的 *čöki* 应更正为 *čöki*。

<sup>②</sup> 维吾尔语吐鲁番土语中 *čükä* 还指“豆荚”, 该词派生出动词 *čükilä*-“结豆荚”; 哈密土语中 *čökä* 指豆子的一个品种(哈密土语调查专组 1997:162)。由于豆荚与一根筷子的形状具有相似性, *čükä/čökä* “豆荚; 一种豆子”可能由 *čükä/čökä/čoka/čöki* “筷子”引申而来。

载为 *čöki*, 筴 (塔依尔·阿布都外力等 2016:577)。李经纬 (1996:298, 2011:522) 认为, 上述 Ot. Ry.1414b 号文献中的 *čöki* “筷子”可能来自汉语“箸”。“箸/筴”都是比较古老的字。“箸”字的中古音为澄御开三去, 遘倨切 (沈兼士 1985:1054), 高本汉 (2021:19) 构拟为 \**ɕʰiwo*。“筴”字的中古音同“箸” (沈兼士 1985:556、1054), 高本汉 (2021) 没有构拟其中古音, Pulleyblank (1991:415) 构拟其晚期中古汉语形式为 \**trfiäʰ/trfiyǎʰ*。可见, 中古汉语“箸/筴”的音节末均没有尾音 \*-k。罗常培 (2012:68) 的构拟中, 御去归入鱼开三, 构拟为 \**u*; 李范文 (1994:291-294) 的构拟中, 御去归入鱼合三, 构拟为 \**jwo*; 罗常培 (2012:144)、高田时雄 (1988:115) 的构拟中, 遇摄或虞摄也都没有尾音 \*-k。由此可以确认, “筴/箸”与 *čükä/čökä/čoka/čöki* “筷子”并无语音对应关系。

这样看来, 表“筷子”义的 3 组字中, “箸/筴”和“快/筷”不可能是 *čükä/čökä/čoka/čöki* “筷子”的词源。那么, 汉字“筴/挾”字会不会就是该词的词源呢?“筴”的中古音为见洽开二入、见帖(帖)开四入, “挾”的中古音为见帖(帖)开四入、见狎开二入 (沈兼士 1985:161)。见母在中古音和唐五代及宋代西北方音均以 \*k- 开头 (罗常培 2012:48、127; 高田时雄 1988:51; 李范文 1994:242-246)。那是否有可能 *čökä* “筷子”的第二音节就来自于“筴/挾”, 第一音节则是“箸/箸”或“竹”字呢? 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 无法得到这样的结论。因为: 第一, 查询相关开放语料库可以得知, 古代汉语文献中“箸/筴”和“筴/挾”并用的情况只在大藏经中出现一例 (“箸筴”) <sup>①</sup>; 第二, 据张芳赐等 (2003:27、40), 《茶经》有“竹筴, 或以桃、柳、蒲葵木为之, 或以柿心木为之, 长一尺, 银裹两头”和“第二沸出水一瓢, 以竹筴环激汤心, 则量末, 当中心而下”的记载 <sup>②</sup>。“竹”字的中古音为知屋合三入, 张六切 (郭锡良 1986:84) <sup>③</sup>, 高本汉 (2021:389) 构拟为 \**tjuk*。庄垣内正弘 (1987:31) 和张铁山 (2005:123) 的对音中, 知母对 *č* <sup>④</sup>, 庄垣内正弘 (1987:77-78) 的对音中, 屋三对应 *u*, 张铁山 (2005:127) 的对音中, 屋韵对 *uq* 或 *iu*。上文讲到“筴/挾”以见母开头的读音皆以 k- 开头。这样“竹挾/竹筴”二字合一似乎能够与 *čükä/čökä/čoka/čöki* “筷子”对应。但是, 9-10 世纪河西方言洽韵、帖韵、狎韵均以 -p 结尾 (高田时雄 1988:180) <sup>⑤</sup>; 宋代西北方音中, 洽韵和狎开二为 \**aʔ*、帖开四为 \**ieʔ*, 入声 \*-p 韵尾并未完全消失 (李范文 1994:331、315、322、325-326); 高本汉 (2021:235) 构拟“挾”的中古音为 \**kiep*, 《康熙字典》(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2007:846) 说“筴”音同“颊”, 高本汉 (2021:235) 构拟“颊”的中古音为 \**kiep*; 庄垣内正弘 (1987:90) 的对音没有洽、帖 2 韵, 但狎韵以及同摄的盍、乏、叶、业 4 韵在回鹘语中对应 *ap/äp/ip/öp*; 张铁山 (2005:134-135) 的对音中, 亦洽、帖 2 韵缺例, 但狎韵对应回鹘语 *ap*, 同摄的盍、叶、业、乏等韵均以 -p/-v 结尾, 且 -v 结尾只有盍韵的一个例子。无法通过维吾尔语的语音规律解释 -b/-p 在 *čükä/čökä/čoka/čöki* “筷子”中的“缺失”。因此, 这一猜测不成立。

<sup>①</sup> 请参见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语料库古代汉语语料,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dir=xiandai](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dir=xiandai) [2022.8.14]。

<sup>②</sup> “竹筴”在《茶经》出现两例, 在明末《二刻拍案惊奇》有几例。请参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计算语言学研究室“语料库在线”网站古代汉语语料, <http://corpus.zhonghuayuwen.org/index.aspx> [2022.8.14]。大藏经另有一例“竹筴”, 请参见请参见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语料库古代汉语语料。

<sup>③</sup> 沈兼士 (1985:335) 旁注为知屋开三。

<sup>④</sup> 张铁山 (2005:123) 认为知母还可对应 *y*, 以 *yinčü* “珍珠”为例。我们认为词首 *y* 是该词借入维吾尔语后从 *č* 音变而来。突厥语族诸语言中词首 *č*、*j* 与 *y* 有对应关系。

<sup>⑤</sup> 罗常培 (2012:159) 的构拟中, 洽、帖、狎 3 韵缺例, 但合摄其他韵母均以 \*-b / \*-p 结尾。

我们认为,维吾尔语 *čükä/čökä/čoka/čöki* “筷子”的汉语词源可能是单独的“筴”字。《广韵》中“筴”还有一种音是初麦开二入,楚革切,释为“卜筮筴也”(沈兼士 1985:162),高本汉(2021:323)构拟为 \*tʂʰæk。“筴”的“策、册、栅”等释义(王力 1992:350-351)基本都与细长的木、竹条有关。罗常培(2012:44、85、123-124、162)构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没有单独的初母,但“初”母归入穿母,构拟为 \*cʰ-, 麦开二构拟为 \*-eg; 五代西北方音也没有初母,穿母构拟为 \*cʰ-, 麦开二缺例,构拟为 \*-eg。9、10世纪河西方言中,初母为 \*tʂʰ- (高田时雄 1988:66), 麦开为 \*äk (高田时雄 1988:181)。12世纪西北方音中,初母已与彻、澄、崇、昌4母合为一类,构拟为 \*tʂʰ- (李范文 1994:237、328), 麦开二为 \*-eʔ (李范文 1994:320-321)。庄垣内正弘(1987:34、89)的对音体系中,初母对回鹘语 č; 无麦韵,与麦韵同属梗摄的陌韵对 aǰ/iǰ。张铁山(2005:124-125、132-133)认为,汉语初母对回鹘语 č, 麦韵对回鹘语 aǰ; 但是与麦韵同属梗摄的陌韵却对应回鹘语 äg/ah。张铁山、朱国祥(2014)指出,中古汉语入声 \*-k 韵尾对应古代维吾尔语 \*-ǰ、\*-k 和 \*-h。

可以确定,如果“筴”进入古代维吾尔语,则应以 č 开头。但其尾音与 *čükä/čökä/čoka/čöki* “筷子”的语音结构有出入。根据汉语音韵学的构拟,可以确认若“筴”在11世纪初进入古代维吾尔语,则应该带尾音 \*-g/\*-k。尽管张铁山(2005:132-133)认为麦韵对 aǰ, 但只举了一个例子。考虑到维吾尔语的语音和谐规律和同摄其他韵母的对音,笔者认为麦韵还可以对应古代维吾尔语 \*äk。“筴”可能以 \*čäk 的形式进入回鹘语,为了发音便利而增加了一个 -i 元音,变成 \*čäki。后来再经历语音变化,变为 \*čöki。在尾音 -i 的问题上,不排除有介语的可能性,如 Wilkens(2021:255)提出 *čöki* “筷子”可参见蒙古语 *čöki*。尾音 -i 变为 -a/-ä 则是明清以后发生的。

综上所述,维吾尔语 *čükä/čökä/čoka/čöki* “筷子”的词源应是汉语“筴”,至晚在 Ot. Ry.1414b 号文献的书写年代已经进入维吾尔语。笔者认为,*čükä/čökä/čoka/čöki* “筷子” < “筴”是高昌回鹘王国所遗留的汉语底层词汇,不应简单处理为汉语借词。该词不见于汉语借词较多的汉译回鹘文佛教经典中,而且也极具城市文明、农业文明特色,以游牧为生的回鹘人西迁之前不太可能接受该词。当回鹘人从游牧社会转型为农业社会、城市社会之后,中原文化影响日趋增强。“（回鹘社会中）显赫人物的腰带上有时还用小皮条或小绳子拴着某些日用品,即……盛两双筷子或者盛两支笔的长匣子”（冯·加班 1989:98），这使得筷子成为文明的标志逐渐风靡。从筷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与重要性来看,该词也具有典型语言底层特征。这对从语言方面论述新疆各民族血浓于水的兄弟情谊具有重要价值。

另外,该词在维吾尔语哈密土语中称作 *čöküş* (哈密土语调查专组 1997:162)。鉴于 *čöküş* “筷子”指一般的筷子以外,还指炸馓子时使用的长筷子,我们认为其中的 -š 与指小表爱成分 -š 无关,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冗余成分。如 *nalä* “呻吟”也有 *naläs* “呻吟”的形式,近代维吾尔语中 *ada* “结束”也有 *adaš* “结束”的形式,并不影响其语义。

新疆南部维吾尔语各方言土语一般用 *koyza* “筷子”,不用 *čökä/čükä/čoka/čöki* “筷子”。*koyza* “筷子”明显来源于汉语“筷子”。Shaw(1880)和 Jarring(1964)都没有记录该词。*koyza* “筷子”第一次出现在《维汉字典》(杨涤新 1947:81)。据此,*koyza* “筷子”进入维吾尔语的时间应为清末至民国时期。

### (三) *jimbil*

陈宗振(1982)、哈密土语调查专组(1997:157)认为,维吾尔语 *jimbil* “蒸篦子”来源

于汉语的“蒸篦(子)”。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可作进一步考证。如果该词的汉语原词只是“蒸篦”的话, *jimbil*“蒸篦子”的尾音 *-l* 无法解释。因为不管中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 “篦”字都没有以 *-l* 结尾的情况, 无法解释该词在进入维吾尔语时为何凭空出现 *-l* 音。另, 《五体清文鉴》中 *jimbil*“蒸篦”的语义也不支持其源于汉语的“蒸篦”。

早于《五体清文鉴》的文献中并不见 *jimbil*“蒸篦子”。《五体清文鉴》中 *jimbil* 对应“蒸笼”, 而“蒸篦子”的对应词是 *tizma* (塔依尔·阿布都外力等 2016:579)。由此可见: ① *jimbil*“蒸篦子”在维吾尔语里经历了由[蒸笼]到[蒸篦子]的语义替换过程; ②在《五体清文鉴》编纂之时, *jimbil*“蒸篦子”应该刚刚进入维吾尔语不久, 此后才一方面经历语义替换, 另一方面与原有词汇 *tizma*“蒸篦子”进行竞争, 并最终取代 *tizma*“蒸篦子”。现在 *tizma*“蒸篦子”已不使用。

考虑到《五体清文鉴》中 *jimbil* 的“蒸笼”义, *jimbil*“蒸篦子”的词源应是“甑算”。该词中的“算”字在一些文献里以“篦、箒”等字记录, 其义基本一致。而“甑算”在现代汉语各个方言里的语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A. 蒸馒头的笼屉(刘育林、安宇柱 1991:91); B. 蒸米饭、馒头的算子(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7298-7299;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2006:168)。据此可以认为, 维吾尔语 *jimbil* 所经历的语义演变一直处于汉语的影响之下, 即从该词进入维吾尔语起 A、B 两种语义就一直存在, 只是起初 A 义通行, 后来 B 义逐渐压制直至排除了 A 义。至于其语音上的对应, 可解释为: ①“甑”在陕西北部等地可读作 /tʃiŋ<sup>51</sup>/ 或与之基本一致的读音(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7298), 其声母 /tʃ/ 恰恰对应维吾尔语 *jimbil*“蒸篦子”的起首辅音 *j*。光绪六年《汉回合璧》里“甑”的维吾尔语记录为 *jiŋ* (陈宗振 1989)<sup>①</sup>。甑读作 /tsəŋ<sup>51</sup>/ 的情况下也能与汉语借词在维吾尔语中的发音对应。汉语 /ts/、/ts<sup>h</sup>/、/s/ 在清朝时期有对维吾尔语 *j*、*č*、*š* 的情况, 如 *čäydo* < “菜刀”、*bäčäy* < “白菜”、*jasüy* < “杂碎”等。②进入维吾尔语后, “蒸”的尾音 /ŋ/ 在第二音节首音 *b* 的作用下逆同化为 *m*<sup>②</sup>。③若 *jimbil*“蒸篦子”的词源只是“甑算”的话, 词末辅音 *-l* 无法解释。因此, 该词应该还有一个儿化音, 如西安话 /tʃiŋ<sup>55</sup>. piər/ “甑算儿”(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2006:168)。儿化音也是汉语新疆方言的一个特点。维吾尔语哈密土语中 *jimbil*“蒸篦子”至今以 *jimbir*“蒸篦子”形式使用(哈密土语调查专组 1997:157)。由此看来, *jimbil*“蒸篦子”源于“甑算儿”是成立的。

#### (四) *čöčürä*

维吾尔语文学语言称“馄饨”为 *čöčürä*, 维吾尔语吐鲁番土语称作 *čü:šür*。学界尚未见到 *čöčürä*“馄饨”的词源研究。历代维吾尔语文献中, 《五体清文鉴》首次记载了“馄饨”对应 *čöčbürä* (塔依尔·阿布都外力等 2016:644)。对于 *čöčürä/čü:šür*“馄饨”的词源, 可以有两种解释: ① *čöčürä/čü:šür*“馄饨”可能是《五体清文鉴》中的 *čöčbürä* 经过语音变化而来的。维吾尔语中音节开头的辅音 *b* 往往弱化为 *w*, 如 *aq*“白” *baş*“头” > *aqwaš*“白头发的”、*aq*“白” *biläk*“臂, 叶” > *aqwiläk*“白菜”、*kök*“青” *böräk*“肾脏” > *kökwöräk*“无赖、爱吵

<sup>①</sup> 据陈宗振(1989)介绍,《汉回合璧》中“甑”的维吾尔语对应词写作 *jik*, 汉字注音则说“同汉语”。《汉回合璧》中维吾尔语词汇用近代维吾尔文记录, 其中 *ŋ* 音用 *nk* 两个字母记录。由此陈宗振将《汉回合璧》中“甑”的维吾尔语对应词比定为 *jiŋ*。《汉回合璧》的刻字工匠不谙维吾尔语, 因此, 可能存在错误。

<sup>②</sup> 由于没有 *\*jiŋbil* 或 *\*jiŋbir* 形式的记载, 不能确定 *ŋ > m* 音变是该词借入维吾尔语时就发生的还是后来发生的。

闹的、不听哄的(指小孩)”等<sup>①</sup>；而后在连读的情况下 w 脱落，原属于第一音节的 č 归并到第二音节，并在部分地区更进一步音变为š。《五体清文鉴》的原文中，该词写作 جوچ بره (北京故宫博物院 1957:3822)。近代维吾尔文中字母 چ 可以表示 j、č 两个音，ب 可以表示 b、p 两个音。《五体清文鉴》维吾尔语词汇的满文注音写作 cucubere (北京故宫博物院 1957:3822)，其中 -ube- 应为 -bu- 之讹写。因此不排除《五体清文鉴》整理者误读 bürä 的可能性，该词完全有可能读作 čöčpörä。而 pörä 在现代维吾尔语中表示“菜盒子/合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06:219)。但采取这一解释，čöč 就会成为无法解释词源的孤词。②čöčürä“馄饨”可能来源于中原官话里“煮角”的儿化音形式(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5955)，《五体清文鉴》记载的 čöčpörä“馄饨”仅在现代维吾尔语哈密土语中以 čöpjür“馄饨，饺子”的形式遗存(哈密土语调查专组 1997:162)。“饺饵、饺子”古时原称“角耳、角子”，“饺”字是后来才造出来的，“角”与“饺”音同。还有“水饺、水角子、水饺子”等词表示饺子或馄饨，且只要有儿化音或将“子”换成“饵”就都能在语音上与 čöčürä 进行对应。但是，“水饺”是淮阴官话、西南官话和徽语词汇(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987)；“水角子”是冀鲁官话和吴语词汇(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996)；“水饺子”是淮阴官话和赣语词汇(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999)。从维吾尔语与汉语的接触情况来看，中原官话在汉语方言中占优势，吐鲁番和哈密地区的汉语方言就属于中原官话。因此，在以上几个汉语词汇中，只有“煮角”的儿化音形式，如西安话“煮角儿”(伍永尚 2007:105)，最有可能是 čöčürä“馄饨”的词源。

#### (五) \*düm

《维汉大词典》解释维吾尔语动词 dümlä- 为“盖严(锅盖)；焖，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06:498)，《维吾尔语详解辞典》(三)除与之相似的：A. “将锅或蒸锅的盖子盖严实，使得蒸汽不会散溢”之义外，还解释了另外两种引申义，即 B. 关紧门窗等以及其他缝、口子和 C. (在人的)身上盖上被褥或大衣等，使之裹紧(阿布利孜·牙库甫等 1992:145)。但是《维汉大词典》中由 dümlä- 派生而来的形容词 dümlimä 在与一些食物名称组合成菜肴名时，除焖蒸(如 dümlimä beliq“蒸鱼”)之义外，还有“炖煮”之义，如 dümlimä toxu“炖鸡”、dümlimä göš“炖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06:498)。按照维吾尔语词缀 -lA (-la/-lä) 的功能，\*düm 本应该是表示“炖煮，焖蒸”义的名词性独立语素，但维吾尔语并没有独立语素 \*düm“炖煮，焖蒸”。从维吾尔语音系规则来说，以辅音 d 开头的词汇大部分是借词(吐尔逊·阿尤甫 2013b)。《五体清文鉴》之前的文献并没有 \*düm 的记载；维吾尔语有另外一个副词 düm，意为“倒着，反扣地”，但与此处的 dümlä- 没有语义联系。

\*düm 应源自汉语“炖”。语义上，汉语“炖”与 dümlä-“炖煮，焖蒸”一样有“把食物煨煮熟烂”和“把食物用碗盛着，放在水里加热”两种含义(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2010:2348)，汉语方言中还有“(食物)放在锅屉上蒸，使热或熟”的含义(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2605)或二者兼备(林正秋 1991:367)的情况，与维吾尔语 dümlä-“炖煮，焖蒸”语义相通。维吾尔语从其他语言借入动词时，一般按名词处理，而不是直接运用，如 süylä-“催”<[催(汉语)+词缀 -lā]、sola-“锁，关”<[锁(汉语)+词缀 -la]等<sup>②</sup>。由此可以对其形态作出解

<sup>①</sup> b > w 音变既是历时音变(吐尔逊·阿尤甫 2013a)，也是共时音变(木哈拜提·哈斯木 2012:279)。

<sup>②</sup> 碑铭文献语言有 sī-“撕，辞，拒绝”<“撕”等例外。

释。高本汉（2021）和 Pulleyblank（1991）均没有构拟“炖”的中古音。据《康熙字典》（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2007:617）引《集韵》，“炖”为“他昆切。音噉”“徒渾切。音屯”。高本汉（2021:172、156）构拟“噉”的中古音为 \*t'uən，“屯”的中古音构拟为 \*d'uən。Pulleyblank（1991:313）构拟“屯”的早期官话形式为 \*dwən，没有构拟“噉”的早期官话形式。可以看到，“炖”字的中古音和早期官话形式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读音 dùn 基本一致。由此可以推测明清时期“炖”字在进入维吾尔语时应该是 \*dün 或 \*tün，在辅音 -l- 影响下尾音 -n 音变为 \*düm，但没有文献记载 \*dünlä- 形式。

《五体清文鉴》中 dümlä- 有 tümlägän göş “炖肉”（塔依尔·阿布都外力等 2016:635）和 tümläydu “焖蒸”（塔依尔·阿布都外力等 2016:654）两种形式。同时又有 horlaydu “蒸”（塔依尔·阿布都外力等 2016:654）一词。由此可见：①《五体清文鉴》编纂时，同表示“蒸，焖蒸”义的 dümlä- 和 horla- “蒸”正在竞争，但我们不知道当时哪一个更有优势；②该成分自借入维吾尔语起就带着汉语中的“炖煮，焖蒸”两种含义；③该成分借入维吾尔语初期词首辅音是 t-，后来才浊化为 d-。到了现代维吾尔语时期，dümlä- “炖煮，焖蒸”在竞争中基本胜出，horla- “蒸”的使用频率已经大幅下降；而 dümlä- “炖煮，焖蒸”的两种语义也自借入起就有竞争，其中“焖蒸”义最终占了优势，“炖煮”义不太明显。

另外，陈宗振（2016:301）认为，维吾尔语动词 dämlä- “泡（茶），沏（茶）”即来源于“炖”。《维吾尔语详解辞典》（三）（阿布拉孜·牙库甫等 1992:82）认为，维吾尔语有两个 dämlä-，分别为 dämlä-<sub>1</sub>：A. 用门门锁门；B. 把门关严实，dämlä-<sub>2</sub>：A. 弄严使得不会散溢蒸汽，文火熬煮使得入味；B. 以（食物或食材）本身的蒸汽弄熟。《维吾尔语详解辞典（缩编本）》（海木都拉·阿布都热合曼等 2011:503）同样认为存在两个 dümlä-，其一为 dümlä-<sub>1</sub>，用门闩把门关严实；其二为 dümlä-<sub>2</sub>，A. 用炖煮的方式使得出味道；B. 焖蒸。可以看到，《维吾尔语详解辞典（缩编本）》除了将 dümlä-<sub>1</sub> 的 A、B 义合并为一个释义、将 dümlä-<sub>2</sub> 的释义改动表述之外，没有本质的修订。其中 dämlä-<sub>1A</sub> 是由 däm “门闩”缀接词缀 -lä 派生的动词。但 dämlä-<sub>1B</sub> 其实是 dämlä-<sub>2A</sub> 的引申义，不能将其算作 dämlä-<sub>2</sub> 的同形词，应该归并到 dämlä-<sub>2</sub>，作 dämlä-<sub>2C</sub> 释义。将 dümlä- 的“盖严（锅盖）；焖，蒸”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06:498）与 dämlä-<sub>2</sub> 的 A、B、C 三种语义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dämlä-<sub>2B</sub> 是 dümlä- 的变体，《汉回合璧》“蒸”词条即对应 dämläydu（dämlä- 的第三人称非过去时直接陈述形式）（陈宗振 1989）；后来 dämlä-<sub>2B</sub> 语义扩展为 dämlä-<sub>2A</sub>，dämlä-<sub>2A</sub> 又引申为 dämlä-<sub>2C</sub>。另外，从饮茶历史看，“宋以前行用紧压茶，多将茶叶蒸后捣碎，制为团块状。饮时以水烹煮，且多于茶饮中加入瓜仁、松子等干果，或配以蜜饯等各色糕点。至清代易为沸水冲泡，相沿至今”（华夫 1993:659）。“炖”就是“文火慢煮，煨煮”。这能从另一方面证实 dämlä-<sub>2</sub> 源于 dümlä-。

\*düm 借入维吾尔语的具体时间应早于《五体清文鉴》，只是没有相关文献记载。

### 三 结 语

语言是交际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体现着民族的历史。词汇则是语言最容易受到接触影响的部分。就此看来，维吾尔语中存在来自各种语言的词汇是正常的。维吾尔语词源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考证了维吾尔语中 bi: < “匕”、čükä/čökä/čoka /čöki < “筴”、jimbil < “甑算儿”、čöçürä < “煮角儿”、\*düm < “炖”的词源。

本文采取“汉源词”，指的是“源自汉语的词汇成分”，既包括汉语借词，也包括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底层词。学术界已经考证了许多汉源词，以往都统称为汉语借词，以后还会不断分辨出一些汉源词。在汉源词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辨别其中的汉语底层词，如本文认为 *çökä* < “筵”是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底层词。本文所考证的5个/组词都可归入餐饮类词语，说明自张骞通西域以来，新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就没有中断，文化交流、民族交往交融源远流长。

### 参考文献

- [1] 阿布拉孜·牙库甫等. 1991.《维吾尔语详解辞典》(二)(维吾尔文),北京:民族出版社.
- [2] 阿布拉孜·牙库甫等. 1992.《维吾尔语详解辞典》(三)(维吾尔文),北京:民族出版社.
- [3] 包尔汉. 1953.《维汉俄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 [4] 北京故宫博物院. 1957.《五体清文鉴》(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
- [5] 陈宗振. 1982.《关于维吾尔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的探讨》,载《民族语文》编辑部编《民族语文研究文集》第509-530页,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
- [6] 陈宗振. 1989.《〈汉回合璧〉研究》,《民族语文》第5期.
- [7] 陈宗振. 2016.《维吾尔语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8] 冯·加班. 1989.《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850-1250年)》,邹如山译,吐鲁番: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
- [9] 冯家昇. 1962.《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文物》第7、8期合刊.
- [10] 高本汉. 2021.《汉文典》(修订本),潘悟云等编译,北京:中华书局.
- [11] 耿世民. 1986.《回鹘文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西北民族研究》创刊号.
- [12] 耿世民. 2008.《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3] 郭锡良. 1986.《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4] 哈密土语调查专组编. 1997.《现代维吾尔语哈密土语》(维吾尔文),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
- [15] 海木都拉·阿布都热合曼等. 2011.《维吾尔语详解辞典(缩编本)》(维吾尔文),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16]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 2007.《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17]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2010.《汉语大字典(第2版)》(九卷本),武汉/成都:崇文书局/四川辞书出版社.
- [18] 胡振华、黄润华整理. 1984.《高昌馆杂字》,北京:民族出版社.
- [19] 华 夫主编. 1993.《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上),济南:济南出版社.
- [20] 李范文. 1994.《宋代西北方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1] 李经纬. 1996.《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22] 李经纬. 2011.《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 [23] 力提甫·托乎提. 2012.《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4] 林正秋. 1991.《中国饮食大辞典》,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25] 刘育林、安宇柱. 1991.《陕北方言词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 [26] 罗常培. 2012.《唐五代西北方音》(重排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27]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1.《突厥语大词典》(1-3卷),校仲彝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 [28] 木巴来克·司康旦尔. 2017.《回鹘文文献中的对偶词——兼与现代维吾尔语比较》,中央民族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

- [29] 木哈拜提·哈斯木. 2014.《现代维吾尔语方言语音、语法、词汇比较研究》(第一册),北京:民族出版社.
- [30] 沈兼士主编. 1985.《广韵声系》(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
- [31] 塔依尔·阿不都外力等汇编. 2016.《五体清文鉴》(汉维部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 [32] 吐尔逊·阿尤甫. 2013a.《论维吾尔书面语发展的主要变化及其成因》,载吐尔逊·阿尤甫著《维吾尔语书面语历史问题》(维吾尔文)第23-4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 [33] 吐尔逊·阿尤甫. 2013b.《如何辨别维吾尔语中的外来词》,载吐尔逊·阿尤甫著《维吾尔语书面语历史问题》(维吾尔文)第356-37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 [34] 王力. 1992.《王力文集》(第八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35] 伍永尚. 2007.《原生态的西安话》,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 [36]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2006.《西安市志》(第七卷),西安:西安出版社.
- [3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06.《维汉大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 [38]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 1999.《汉语方言大辞典》(全五卷),北京:中华书局.
- [39] 杨琳. 2017.《“快”“筷”词源新证》,《长江学术》第4期.
- [40] 杨涤新. 1947.《维汉字典》,西安:国立西北大学.
- [41] 殷晓杰、陈春雪、陈佳. 2017.《再论“箸”与“筷(子)”的历时替换及相关问题》,《汉语史学报》第1期.
- [42] 优素福·哈斯·哈吉甫. 1984.《福乐智慧》(维吾尔文),北京:民族出版社.
- [43] 张芳赐等. 2003.《〈茶经〉译释》,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
- [44] 张铁山、朱国祥. 2014.《回鹘文〈金光明经〉中的汉语借词对音研究》,《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
- [45] 张铁山. 2005.《回鹘文献语言的结构与特点》,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46] 朱国祥. 2013.《回鹘文世俗文书中汉语借词对音研究——以山田信夫和李经纬著版本为例》,《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6期.
- [47] 高田时雄. 1988.《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一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东京:创文社.
- [48] 森安孝夫. 1994.《ウイグル文书割記(その四)》,《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6期第63-93页.
- [49] 山田信夫. 1993.《ウイグル文契約文书集成》(第二卷),吹田:大阪大学出版会.
- [50] 庄垣内正弘. 1987.《ウイグル文献に導入された汉语に関する研究》,《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所》第3期第17-156页.
- [51] Ağca, Ferruh. 2006. *Eski Uyğur Türkçesiyle Yazılmış Eserlerin Ses ve Şekil Özelliklerine göre Tarihlendirilmesi*. Ankara: Hacettepe Üniversitesi Doktora Tezi.
- [52] Căferoğlu, Ahmet. 1993. *Eski Uyğur Türkçesi Sözlüğü*. İstanbul: Enderun Kitabevi.
- [53] Clauson, Sir Gerard. 1972.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 [54] Courtelle, Par M. Pavet De. 1870. *Dictionnaire Turk-Oriental*. Paris: L'imprimerie Imperiale.
- [55] Erdal, Marcel. 1991. *Old Turkic Word Formation: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Lexico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 [56] Jarring, Gunnar. 1964. *An Eastern Turki-English Dialect Dictionary*. Lund: Hakan Ohlssons Boktryckeri.
- [57] Kara, Georg & Peter Zieme. 1976. *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 [58] Kaya, Ceval. 1994. *Uyurca Altun Yaruk: Giriş, Metin ve Dizin*. Ankara: TDK Yayınları.
- [59] Pulleyblank, Edwin. G. 1991.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BC Press.
- [60] Rachmati, G. R. 1932. Zur heilkunde der Uiguren. I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p. 401-448. Berlin: Verlag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61] Shaw, Robert Barkley. 1880. *A Sketch of the Turki Language as Spoken in Eastern Turkistan*. Part II. *Vocabulary Turki-English*. Calcutta: The Baptist Mission Press.
- [62] Shōgaito, Masahiro. 2003. *Uighur Manuscripts in St.Petersburg Chinese texts in Uighur script and Buddhist Uighur texts*. Kyoto: 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 Kyoto University.
- [63] Wilkens, Jens. 2021. *Handwörterbuch des Altuigurischen*. Göttingen: Universitätsverlag Göttingen.

## A Study on Several Words with Chinese Source in Uyghur

Örkesh Abliz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tymology of several words in Uyghur, including *bi*: ‘knife’, *čükä* /*čökä*/*čoka*/*čöki* ‘chopsticks’, *jimbil* ‘steaming grate’, *čöčürä*/*čü:šür* ‘wonton’, and *\*düm* ‘stew’, which have an intimate connection with Chinese. Based on the study, the author argues further that the words *bi*: < *bǐ* (匕), *čükä* /*čökä*/*čoka*/*čöki* < *jiā* / *cè* (筴), *jimbil* < *zèngbì*’er / *jìngbì*’er (甑篲儿), *čöčürä*/*čü:šür* < *zhǔjiǎo*’er (煮角儿), and *\*düm* < *dùn* (炖) are words with Chinese source, and *čükä* /*čökä*/*čoka*/*čöki* is a Chinese substrate word in the Uyghur language.

**[Keyword]** Uyghur language Chinese language word with Chinese source loanword linguistic substratum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